

唐宋詩之爭概述

齊治平



岳麓書社

唐宋诗之争概述

齐治平 著

115/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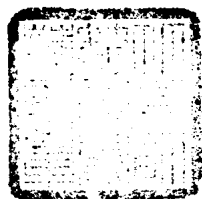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51093

岳麓书社

一九八三年·长沙



951093

唐宋诗之争概述

齐治平 著

责任编辑：李传书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4,000 印张：4.5 印数：1—16,9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8 定价：0.50元

目 录

引 言	(1)
南 宋(附金、元)	(4)
(一)南宋人对江西派之评论	(4)
(二)江西派与晚唐体之离合	(8)
(三)永嘉、江西两派之对垒	(12)
(四)严羽“以盛唐为法”，“说江西诗病”	(23)
(五)王若虚、元好问论唐宋诗	(28)
明 代	(36)
(一)明初诗派皆主唐音	(36)
(二)前后七子“诗必盛唐”之说	(41)
(三)明初以来之鼓吹宋诗者	(54)
(四)公安派对七子之排击	(57)
(五)竟陵派与《竟陵诗解驳议》	(65)
清 代	(69)
(一)清初之宗宋诗者	(70)
(二)清初之倡唐诗者	(81)
(三)格调说、性灵说、肌理说之倾向	(112)
(四)“同光体”及其反对者	(125)
结 语	(133)
后 记	(140)

引 言

我国古典诗歌以五七言为主。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之作品，各有其风格及特色。但在唐以前，律诗与绝句尚未定型，体裁未备；自宋以后，历代作者虽各有制作，各自成家，而大致不能越出唐、宋之范围。其间以时代风气之不同，作者好尚之各异，遂致分唐界宋，入主出奴，聚讼不休，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长期之争论。总结此长期之争论，就纵的方面而言，有助于了解南宋以来历代诗坛风尚之嬗变；就横的方面而言，则可以了解唐、宋诗之特点，以及学唐、宋诗者分合异同之故。此于研习古典诗歌及文学史、文学批评皆甚有意义之事也。

唐、宋诗之分野，非仅朝代之别，实由风格之殊。大抵宋初诗人，犹沿唐风，所作均不出中、晚唐之范围。其后梅尧臣、苏舜钦稍变旧习，复经欧阳修之鼓吹倡导，始首开宋诗风气。欧公所为《梅圣俞墓志铭》，盛称梅诗，以为“其初喜为清丽，闲肆平淡，久则涵演深远，间亦琢刻以出怪巧，然气完力余，益老以劲。其应于人者多，故辞非一体，至于它文章皆可喜；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，僻固而狭隘也。”此数语中，平淡、深远、怪巧、老劲，皆描摹梅诗进境，颇为肖似，而最后两句，则直谓其“辞非一体”，非如唐诗人之“僻固狭隘”，

则其有意别创新裁以与唐诗立异之宗旨，显然可见。故就理论方面而言，唐、宋诗之争端，实自欧阳氏启之。清人谓“宋人诗文，皆至庐陵而一变，有功于文，有罪于诗；自作者害人浅，论他人诗害人深。”虽不免门户之见，而谓宋诗变始欧公，实探本之论也。

欧公诗论，散见于文集及诗话中。宋人皆谓其“不甚喜杜诗，谓韩吏部绝伦。”（刘攽《中山诗话》，参《后山诗话》等书）语当可信。《六一诗话》极赞韩诗，称“其资谈笑，助谐谑，叙人情，状物态，一寓于诗，而曲尽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，固不足论，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。盖其得韵宽，则波澜横溢，泛入旁韵，乍还乍离，出入回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，如《此日足可惜》之类是也。得韵窄则不复旁出，而因难见巧，愈险愈奇，如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之类是也。余尝与圣俞论此，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，通衢广陌，纵横驰逐，惟意所之。至于水曲蛄封，疾徐中节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”盖欧公不独文宗韩愈之文，以起五季、宋初之衰；其诗亦宗韩愈之诗，以开宋诗之经。宋人谓“退之以文为诗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，或谓其诗“乃押韵之文”（沈括语，见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），而清人亦谓欧诗“逆转顺布”“全用古文章法”（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）。此实唐诗之一大解放：就内容言，则谈笑、谐谑、人情、物态，无不可寓于诗中；就形式言，则铺叙、议论、博依广引，无不曲尽其致。故宋诗之散文化，议论化，讲求押韵，种种法门，皆开自欧公。其是非功过，在当时已有异论（如沈括、吕惠卿等关于韩诗之争论，刘攽谓欧公评

鸞昌黎、圣俞之未为知心赏音)，为后世争唐争宋之滥觞；而宋诗之所以别于唐而为宋，则欧公倡导之力，实有以先之。

然欧公于宋诗，盖所谓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者。欧门下有苏轼，轼门下有黄庭坚，二子继起，各开生面，“子瞻以新，鲁直以奇”，卓然成家，笼罩当世，宋诗至此，遂臻极盛。论者至谓宋诗之有苏、黄，犹唐诗之有李、杜焉。元祐以后，诗人迭起，莫不以二家为依归，而黄诗尤戛戛独造，字法句法，迥脱恒蹊，最足以代表宋诗之艺术特色。厥后学者承风，衍为江西宗派，至南宋而弗衰。清代翁方纲论之云：“谈理至宋人而精，说部至宋人而富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，盖抉刻入里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。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（庭坚）为之提挈，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，实乃南渡以后，笔虚笔实，俱从此导引而出。”（《石洲诗话》）故就苏、黄而论，黄之影响为尤大，实唐、宋诗转变之关键人物也。要之，苏、黄以前，宋诗尚未自成面目；苏、黄以后，宋诗始别于唐诗而独树一格。论诗之士，好尚不同，各持所见，而唐、宋之争以起，自南宋以迄近代，历时八百年之久，实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，学诗谈艺者不容不注意及此也！兹略按时代先后，分别述之。

南宋（附金、元）

（一）南宋人对江西派之评论

唐、宋分而异议起，宗派立而聚讼烈，故论唐宋诗之争，当自南宋始。诗家之有门庭，自昔已然，建安七子，为其权舆；而诗家之立宗派，如禅门之传法传衣者，则肇始于吕本中之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。其图以黄庭坚为首，下列陈师道、潘大临等二十五人。其序略云：

唐自李、杜之出，焜耀一世，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。……元和以后至国朝，歌诗之作或传者，多依效旧文，未尽所趣。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，扬抑反复，尽兼众体，而后学者同作并和，虽体裁或异，要皆所传者一。予故录其名字，以遗来者。

其意盖以山谷为初祖，而后山以下皆其法嗣焉。自此以后，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，而南宋诗坛遂为其所笼罩。然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故攻驳之者，亦颇不乏人。胡仔即谓：“居仁（本中）此图之作，选择不精，议论不公”，并力驳其独宗山谷之说，以为“豫章自出机杼，别成一家，清新奇巧，

是其所长；若言反复抑扬，尽兼众体，则非也。”（《茗溪渔隐丛话前集》）又陈岩肖亦谓“近时学其诗者，或未得其妙处，每有所作，必使声韵拗戾，词语艰涩，曰‘江西格也’。此何为哉！”（《庚溪诗话》）盖自黄诗衍为宗派之后，学者株守一家之说，研习一家之体，剽窃稗贩，变本加厉，宜其来识者之讥议矣。

然最早发难于苏、黄及江西派者，当推张戒，其《岁寒堂诗话》中有与吕居仁论山谷学杜未为得髓之语，居仁为之折服，则其人固与江西派中人往还而首持异议者。其说云：

自汉、魏以来，诗妙于子建，成于李、杜，而坏于苏、黄。余之此论，固未易为俗人言也。子瞻以议论作诗，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，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，诗人之意扫地矣。段师教康昆仑琵琶，且遣不近乐器十余年，忘其故态。学诗亦然，苏、黄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唐人诗；唐人声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六朝诗；雕刻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曹、刘、李、杜诗。

诗以用事为博，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；以押韵为工，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、黄。……苏、黄用事押韵之工，至矣尽矣，然究其实，乃诗人中一害，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，而不知咏物之为工，言志之为本也。《风》《雅》自此扫地矣。

其言就诗体派别立论，称扬汉、魏、六朝、唐人，以为“苏、黄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唐人诗。”又尝分古今之诗为五等，而

谓“国朝诸人诗为一等，唐人诗为一等。”凡此皆显然区画唐、宋，而力诋苏、黄，至有“风雅扫地”之叹，后世扬唐抑宋之论，殆以此为嚆矢矣。

稍后则有朱熹，以理学家而留意诗文，其论诗之语，后人辑为《清邃阁论诗》，于苏、黄亦多指摘，而其论二家与唐人之别，则尤为造微。如山谷盛称老杜夔州以后诗，以为“句法简易而大巧出”，“不烦绳削而自合”。（《与王观复书》）而朱氏则云：“杜甫夔州以前诗佳；夔州以后，自出规模，不可学。”盖有见于夔州以后诗与诸唐人有别，而江西诸人则多学此种也。又云：“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。吕居仁尝言诗要字字响，其晚年都哑了，不知如何以为好否。”则谓江西诗人学杜晚年之作，音节蹇涩也。又云：“苏、黄只是今人诗。苏才豪，然一滚说尽无余意；黄费安排。”又云：“古人文章，大率只是平说，而意自长；后人文章，务意多而酸涩。如《离骚》初无奇字，只恁说将去，自是好；后来如黄鲁直，恁地着力做，却自是不好。”此皆讥黄诗逗凑诘屈，不文从字顺也。又云：“江西之诗，自山谷一变，至杨廷秀（万里）又再变。杨大年诗巧，然巧之中犹有混成的意思，便巧得来不觉。……今人都不识这意思，只要嵌事、使难字，便云好。”此则直斥江西之支离艰涩，不如晚唐昆体矣。

然与朱熹同时讲学者有陆九渊，字子静，人称象山先生，则对江西诗派，极口称赞。其《与程帅》云：

伏蒙宠贻《江西诗派》一部二十家，异时所寻绎而不能至者，一旦充室盈几，应接不暇，名章杰句，炫耀心

目，执事之赐伟哉！诗亦尚矣，原于《风》、《雅》。……隋、唐之间，否亦极矣。杜陵之出，爱君悃时，追蹶《骚》《雅》，而才力雄厚，伟然足以镇浮靡，诗家为之中兴。自此以来，作者相望。至豫章而大肆其力，包含欲无外，搜抉欲无秘，体制通古今，思致极幽眇，贯穿驰骋，工力精到。一时无陈、徐、韩、吕、三洪、二谢之流，翕然宗之，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各天下；虽未极古之原委，而其植立不凡，亦宇宙之奇诡也！（《象山全集》卷七）

此书末云：“某亦江西人也，敢不重拜光宠。”则是难免乡曲之私，阿其所好；而其《与沈宰》书则谓：“非一时之说，愚见大概如此。”然其说适与朱熹相反，故朱熹斥之云：“江西士风，好为奇论，耻与人同，每立异以求胜，如荆公、子静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一百二十四）又云：“大率江西人，都是硬执他底横说。如王介甫、陆子静。”（同上，一百三十九）此虽不专为论诗而发，而论诗亦其中之一节也。至陆氏门人包恢，则更由重江西而轻晚唐，其《答傅当可论诗》，盛称傅氏“始终皆追晋、宋之风，而绝不效晚唐之体，……此其过人远矣。”（《敝帚稿略》卷二）与朱熹之称昆体“犹有浑成的意思”者，亦相牴牾。盖朱、陆学术门户不同，故议论亦多不合如此。

朱、陆皆南宋理学大家，论诗虽不合，而尚不屑直接介入当日诗坛之争论；至叶适亦以讲学而留意文事，乃奖掖“四灵”，标榜唐人以与江西相抗，而唐宋诗之争乃开一新局。俟后节详之。

(二)江西派与晚唐体之离合

宋诗风气开自欧阳修，苏、黄皆其后起，故述江西派与晚唐体之关系，亦当溯其渊源，自欧阳修始。

欧公所以首开宋诗之风，实由欲矫宋初诗人规模晚唐之习。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谓：“欧阳文忠公诗，始矫昆体，专以气格为主，故其言多平易舒畅，律诗意所到处，虽语有不伦，亦不复问，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，倾困倒廩，无复余地。”此论欧公诗风与昆体之别，语颇扼要。昆体作者以李商隐为宗，固晚唐之支流余裔也。然今观《六一诗话》，于昆体诸人尚多回护奖饰，如云：“杨大年与钱、刘数公唱和，自《西昆集》出，时人争效之，诗体一变。而先生老辈，患其多用故实，至于语僻难晓，……盖其雄文博学，笔力有余，故无施而不可，非如前世号诗人者，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，如许洞所困者也。”此所谓如许洞所困者，乃指宋初九僧辈之晚唐体诗。《诗话》又尝记许洞会九僧等分题赋诗，相戒以不得犯“山、水、风、云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露、星、月、禽、鸟”等字，于是诸僧阁笔云云。则欧公虽“始矫昆体”，而所斥绝者尤在九僧一派纤巧之作。前引欧公称梅圣俞诗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之僻固狭隘”，当亦指晚唐诗人而言，不特以《圣俞墓志》合《诗话》观之，所言若合符节，其意灼然；且盛唐诸公之作，又乌得以“僻固狭隘”目之？欧公通人，固不知是之妄也。

《六一诗话》作于欧公晚年，其评鹭时流，语多平恕，不

惟于昆体未尝菲薄；即于九僧之诗，亦不没其佳句，且致慨于其姓名之湮晦，诗集之不传（按九僧诗流传情况，见司马光《续诗话》），则虽有意力矫晚唐之弊，而固非不知异量之美者。盖欧公虽专主气格，平易疏畅，开宋诗散文化之先河，而当时尚未形成宋诗之体制风格，蕴而初发，明而未融，尚无以大异于唐诗也。其后黄庭坚亦尝从事于李商隐、唐彦谦，以上溯杜甫；及其成家之后，则教学者力戒晚唐之习，尝谓：“学老杜诗，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也；学晚唐诸人诗，所谓作法于凉，其弊犹贪，作法于贪，弊将若何！”（《山谷老人刀笔》卷四《答赵伯充》）其辞气严峻，较欧公变本加厉。盖斯时宋诗已定型，迨江西派兴而门户之见益深，遂与晚唐对立，俨如敌国矣。

故宋人之诗，欧公始与晚唐离；山谷始与晚唐绝；至永嘉派复扬九僧晚唐体之焰，而江西派乃起而与之争。其间往循环，寻仇启衅，实由操术之不同，作风之迥异。陈师道云：“宁拙毋巧，宁朴毋华，宁粗毋弱，宁僻毋俗，诗文皆然。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宋人每以黄、陈并称，知此非后山一人之私言，实为江西相传之诗法。以此绳之，则晚唐之作，偏于巧、华、弱、俗；而江西之作，则每流于拙、朴、粗、鄙。两派诗风既如泾渭之分流，故其争论亦遂如矛盾之相搏也。然学江西诗之久而生厌者，乃往往一转而趋晚唐。徐俯尝谓“荆公诗多学唐人，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。”（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引）韩驹亦谓“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，然谓其非诗不可；今人作诗句语轩昂，止可远听，而其理则不可究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十六引）二人皆江西派

中人，而其称扬晚唐如此，见异思迁，逃杨归墨，不惟足征两派风格之殊异，亦诗坛风气将变之先兆矣。

稍后如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亦极赏晚唐，其《读〈笠泽丛书〉》三首之一云：

笠泽诗人千载香，一回一读断人肠。晚唐异味同谁赏？近日诗人轻晚唐。（《诚斋集》二十七）

又《答徐子材谈绝句》云：

受业初参且半山，终须投换晚唐间；《国风》此去无多子，关捩挑来只等闲。（同上，三十五）

盖诚斋于诗，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，尝自焚其少作千余篇，皆效江西体者。而其转变关键，则在从事晚唐人之诗。其《荆溪集自序》云：“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，既又学后山五字律，既又学半山老人七言绝句，晚乃学绝句于唐人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八十）此所云“唐人”，证之《诚斋诗话》所云：“五七言绝句最少而最难工，晚唐人与王介甫最工于此。”可见实指晚唐人，则答徐子才所谓“终须投换晚唐间”者，正诚斋自道其学诗经历也。诚斋初参半山，终投晚唐，与前引徐俯之言，如针芥相契，不知曾受其启发否。要之，诚斋既脱略江西而深赏晚唐异味，长言咏叹，津津乐道，故对“轻晚唐”之“近日诗人”，颇示不满。其所谓近日诗人，亦即韩驹所斥“句语轩昂，理不可究”之“今人”，皆指江西派中人而言。此意见于《双桂老人诗集后序》者，尤为明显，其言云：“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于江西，然知有江西者，不知有唐人；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，是不惟不知唐人，亦不可谓知江西者。”（《诚斋集》七十八）此处“唐人”亦指晚唐人，

且非限于盛唐后之晚唐，实兼指当时学晚唐体之诸人也。观其以江西、唐人对举，而有所左右于其间，则所指实在诗派而非单纯论诗。盖是时江西与永嘉两派之争已起，诚斋之论，虽若意在调停，而词气扬抑；若再就其屡称晚唐诸语观之，则其偏袒永嘉之倡晚唐者，固不难窥见也。

与诚斋并世而有韩、孟云龙之契者，厥为陆放翁。其诗亦濡染晚唐，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；然其论诗，则深鄙晚唐，与诚斋异趣。其《追感往事》云：

文章光焰伏不起，甚者自谓宗晚唐。欧、曾不生二苏死，我欲痛哭天茫茫！（《剑南诗稿》四十五）

又《宋都曹屡寄诗，且督和答，作此示之》云：

……及观晚唐作，令人欲焚笔。此风近复炽，隙穴始难窒。淫哇解移人，往往丧妙质。苦言告学者，切勿为所怵。航川必至海，为道当择术。（同上，卷七十九）

二诗所谓“甚者自谓宗晚唐”，“此风近复炽”者，皆指永嘉派而言。故杨、陆二人论诗之分歧，皆与江西、永嘉两派之争相关联。放翁持论，犹坚守前辈矩矱，恐学者堕入晚唐纤仄之习；而诚斋则别有会心，深赏晚唐异味，谓可上追《国风》。放翁为初学端其趋向，诚斋为作者别开途辙。再则二人对江西诗人之态度亦不相同。放翁始终尊仰，其《观渡江诸人诗》谓：“中朝文有汉、唐风，南渡诗人尚数公。”（《诗稿》六十九）又前引《追感往事》第一首云：“渡江之初不暇给，诸老文辞今尚传；六十年间日衰靡，此事安可付之天？”其言有笃旧之思，以起衰自任；而诚斋则成家之后，一切舍去，其《和李天麟》

云：“学诗须透脱，信手自孤高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四）又《跋徐恭仲省干近诗》云：“传派传宗我替羞，作家各自一风流；黄、陈篱下休安脚，陶、谢行前更出头。”（《诚斋集》二十六）则独往独来，一空依傍，不屑随人作计矣。二人在当时皆诗坛老宿，卓然成家，且皆非江西、晚唐所能限者，而持论则各有抑扬，亦可见当时两派相争之烈，虽旁观者亦不能已于言焉。

（三）永嘉、江西两派之对垒

南宋时期唐宋诗之争，以永嘉派与江西派对垒为其高潮。永嘉之作者为：赵师秀号灵秀，翁卷号灵舒，徐照号灵晖，徐玑号灵渊，四人别号各有一“灵”字，故合称“永嘉四灵”。其诗以晚唐姚合、贾岛为宗，专精五言律诗，“非极莹不出”，以力矫江西派粗硬之弊。四灵在理论上无所建树，全赖其同乡叶适为之标榜提倡，故述永嘉诗论，必以叶氏为魁首焉。

叶适（1150—1223），字正则，学者称水心先生，与陈亮、陈傅良等倡事功之说，世称浙东学派。其论学论文均不满于苏、黄，如论苏轼云：“苏氏‘半’字韵诗（按：指《除夜病中赠段屯田》诗，首二句为“龙钟三十九，劳生已强半。”）酬和最工，为一时所慕，次韵自此盛于天下，失诗本意最多。夫以六义为诗，犹不足言诗，况以韵为诗乎？”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四十七）此与张戒以押韵之工为诗之一害语意相同，他人亦多言及之者；独其论五七言近体，则贬抑杜甫，以为不足以抗衡其他唐人，则实为独得之见。其说云：

诗自曹、刘至二谢日趋于工，然犹未以联属校巧拙；……及沈约、谢朓竞为浮声切响，自言“灵均所未睹”，其后浸有声病之拘，前高后下，左律右吕，匀致丽密，哀思宛转，极于唐人，而古诗废矣。杜甫强作近体，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，然当时为律诗者不服，甚或绝口不道。至本朝初年，律诗大坏，王安石、黄庭坚欲兼用二体（按：盖指古、律二体）擅其所长，然终不能庶几唐人；苏氏但谓“七言之伟丽者”，则失之尤甚，盖不考源流所自来，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！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七）

其意盖以为唐人近体之作，乃自沈、谢发展而来之正格；杜甫专尚“功力气势”，乃自成别调；至王、黄欲以古体为近体，苏则貌似以求之，皆杜甫之支流，而非唐人之法乳也。今观唐人选唐诗，于杜诗初未特为推崇，知当时风尚，诚有如叶氏所言者，则其说亦持之有故。然叶氏所尤痛恶者则在江西派，故又谓：“唐诗通为一家，黄庭坚及江西诗通为一家”，特以唐诗与江西诗并列，而奖率四灵之以唐诗自命者与之对抗。其《徐斯远文集序》云：

庆历、嘉祐以来，天下以杜甫为师，始黜唐人之学，而江西宗派章焉。然而格有高下，技有工拙，趣有浅深，才有大小。以夫汗漫广漠，徒枵然从之而不足以充其所求；曾不如瓶鸣吻决，出毫芒之奇，可以远转而无极也。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。（《水心文集》十二）